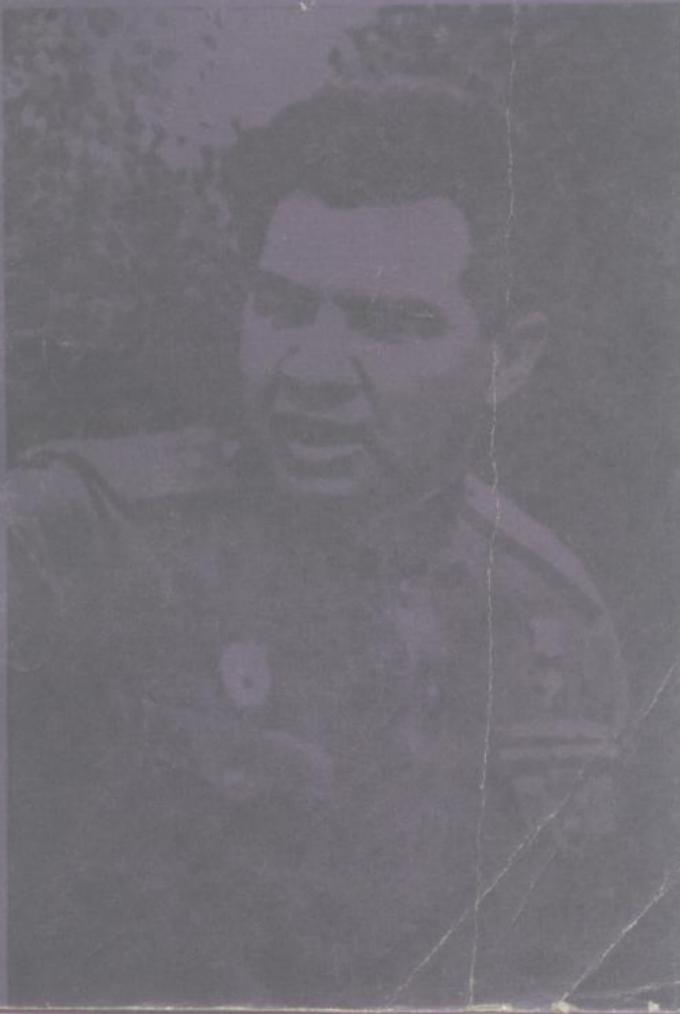


集可共岱佛回之歌

赵云峰 吴蕴辉 译



崔可夫战争回忆录

—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

(上)

B·И·崔可夫著

赵云峰 吴蕴辉译

军事学院出版社

EQ65/C3

崔可夫战争回忆录

——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

(上)

〔苏〕B·И·崔可夫著

赵云峰 吴蕴辉 译

※

军事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红山口甲三号)

石油部管道局印刷厂印刷

北京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 13 $\frac{31}{32}$ 字数 290,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350·6 定价3.00元

出版者的话

该书原名为《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作者以回忆录的形式，叙述了近卫第8集团军(原名为第62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战斗历程。译文流畅，具有文学特色。

作者从战役指挥的角度，生动而具体地描述了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在方面军编成内组织和实施进攻战役的问题，诸如：实施突破、高速度发展进攻、使用快速集群、抗击反突击、克服筑垒地域、强渡大江河、达成突然性以及进行战役伪装、实施战役保障等等。

本书还详尽地叙述了该集团军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情况，特别是对于如何组织和实施大城市防御，提供了具体而十分宝贵的经验。

全书大量篇幅涉及集团军强攻要塞城市和

筑垒地域的组织和实施。对于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突破筑垒地域，对于强攻要塞城市罗兹和波兹南，特别对在强攻大城市柏林中使用强击支队和强击群的经验，均有较详细的叙述与总结。同时，作者多处以战役指挥员的身份，向读者倾诉在战场上的感受，提出了对现代化作战指挥上的一些见解。他还对方面军领导在战役指挥上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些对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和研究苏军的战役指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军事学院外军教研室蔡效英主任对该书译文下册进行了审阅。

目 录

(上册)

作者序.....	1
第一部分 在斯大林格勒交战的日子里	
.....	5
第一章 在远接近地上.....	5
第二章 南部集群.....	65
第三章 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	98
第四章 马马耶夫山岗.....	158
第五章 伏尔加河后面没有我们的退路.....	171
第六章 近卫军的光辉篇章.....	240
第七章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	269
第八章 保卢斯最后的企图.....	326
第九章 坚定顽强的原则.....	359
第十章 毁灭.....	387

作 者 序

回忆……回忆是一种驰突无羁的力量，来之不可御拒，去之不可阻留。对往事的回忆，有时令我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思虑到亲身经历和感受，不由背感寒噤，令人心悸。长此以往，日不平心，夜不成寐。我有时竟扪心自责：追忆过去，心境不该如此，当今现实，远非往事所能比拟。然而，就实而论，往事虽远，却不禁令人神往，遥远的过去令人倍感亲近。

俯冲飞机在上空盘旋，足有千百架，城市经过炮击、轰炸，房倒屋塌，工厂变成破碎碎瓦，大地黑烟缭绕，枪声轰鸣不绝。脚下一片废墟，高楼大厦被夷成平地。电车铁轨扭得弯弯曲曲，高高跷起。碎石、弹坑、洼地……前面便是集团军指挥所，它设在一个高地，冒着枪林弹雨，才能到达那里。往前走，奉命到市中心工厂区负责组织防御。往前走，竟忘却身处险地，只因为专心致志，思虑着如何把打到我城前的敌师阻击，并把它粉碎。

那是在1942年9月12日，任命我担任第62集团军司令员，与第64集团军并肩保卫斯大林格勒。

柏林的大街和广场，曾是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罪恶火焰的地方，如同一堆废铜烂铁、零砖碎瓦。到处是被打烂的钢盔、翻在地上的火炮、失去炮塔的坦克。被烧得只剩下框框的窗子，挂在空荡荡的房屋上，好似一双双眯缝着眼睛。被熏得漆黑的残垣断壁，挂满了厚厚的烟尘。一股股刺鼻

的炸药气体与糊焦味搞得臭气熏天。半明半暗的指挥所里，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列勃斯那张苍白的脸，隐约可见。他来到这里，是为了进行谈判的，想探听一下柏林停火的条件。可是听到的回答却是：

“没有任何可以谈判的余地，只能无条件投降……”这是1945年5月1日前夕，在柏林，在近卫第8集团军指挥所里发生的事。

……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依现代的眼光来看，并不算长途跋涉。因为乘现代化的喷气式客机几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在那战争的年月，要步行，要冒着枪林弹雨，穿过敌人的雷区，攻克敌人坚固的防御地带，克服条条设防的大小河川，两年多的时间里才能走完这段艰苦的道路。社会对我们苏军勇士们大无畏的精神产生一种自豪感。

我已年满八十岁，在这古稀之年，迟愚健忘，不足为奇。多年的往事，历经沧桑，我对于其中某些不见端倪的琐事，也许记忆不清。但是，对于那些关系到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关系到近卫第8集团军从伏尔加河到施普雷河的战斗历程，关系到标志战争胜利结束的攻克柏林等重大事件，我至今仍铭刻在心，虽经三十五年，却仿佛发生在昨天一般。

不言而喻，当我撰写《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这本书的时候，依据了当时的许多文件。但同时也注意了总结经验，对于我所负责的集团军所属各师、团在攻防战斗中作战指挥的经验，进行了总结。

但是应该同时指出的是，撰写此类著作，除了注意文件和专著中历史事件的记载之外，还应当注意当事人内心世界的表露，注意他们如何思考问题，注意他们的思想感受，他

们的苦闷与欢乐，因为这些当事人参加的事件已经载入了光辉的史册。

依我之见，我们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提高人们了解历史的兴趣，更重要的是能直接有助于读者们性格的培养和世界观的形成。如果能把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亲临其境、经受过各种环境考验的人们内心活动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表述出来。依我看，这种披肝沥胆的精神应当加以发扬，应当收入全社会的精神宝库之中。我思考的主要线索是第62集团军的战斗历程。这个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之后改编为近卫第8集团军。我将详细地叙述这个集团军的光辉历程，包括如何攻克柏林。进行思考的锁钥——是我清醒的头脑，它使我能够从当今的角度去深刻而全面地理解过去的亲身经历和内心感受。

我们国家的铜墙铁壁——主要是人。就是到了近乎山穷水尽，如履薄冰的危难处境，我们的战士对于必胜的信念，仍旧是百折不挠，坚不可摧。这就是铁证。

这种表现的根源对希特勒战略家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当人们认识到他对时代，对人民承担的责任时，他的智慧，精神力量，就会无穷无尽，无法估计，就会变成现实的力量。我们盼望已久的事，终于变成了现实。那就是我们站稳脚跟之后，便向西反攻，最后打到了柏林！在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国度里，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遵照列宁的教导，重视发挥人的才能，是使士气高昂，创造性地完成各项任务的无穷源泉，对于那些敌视我们生活方式的人来说是绝对无法理解的。自从苏维埃政权初建以来，我们的党就教育每个人要牢固树立这种思想；教育我们，为了子孙后代去经受严峻的考

验。因此应该感谢我们的党，并为此感到自豪。

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伟大列宁的一句话：知道为何而战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我们深知为何而战，我们终于胜利了！但愿那些为反对我国，反对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又在酝酿着狂妄的冒险计划的人们，也能懂得这个道理。否则他们必将落到1945年5月间第三帝国刽子手们的下场。

我在这本回忆录中，准备具体地介绍近卫军战士们从伏尔加河到施普雷河的战斗道路，介绍他们培养坚定思想的经历，以及他们在战火中如何善于生活、善于斗争的情景。

第一部分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日子里

第一章 在远接近地上

每个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的人，当他们迈向勇敢坚定的精神高峰时，都有过自己的经历。尽管每个人的命运不同，建立丰功伟绩和走过的道路不同，但是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祖国——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儿女。

我于1900年2月12日出生在银池村一个农民的家庭。当时这个村子属土拉省管辖，现在已经是莫斯科省一个地区的中心。

我12岁的时候便背上背包走出家门，到皮特尔去谋生。离开养育我的老家，意味着离开了自己的童年，开始独立生活。

我常常回忆起彼得格勒城中心喀山大街上的一个作坊。作坊老板叫彼得·萨维尔耶夫，专门生产马靴上的一种刺马针。这种刺马针使用时能发出一种悦耳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在当时很有名气。

到了1915年，作坊里干活儿的人只剩下了老人和小孩。工人们都被赶到前线同德国人打仗去了，我们从早到晚干活儿，一点不得歇息。第一批活儿还没有脱手，第二批就又紧

跟上来。抄起生满铁锈的带角的原材料，把它放进平口钳里……到处是铁器、生铁、钢材。干这种活儿不能有半点偷懒，必须拼出全身的气力，不然赚的钱就不够糊口。

中午时候，作坊里特别闷，尘土里夹杂着金属粉末，四处飞扬。人们喉咙发堵，双手无力，肩和背象灌了铅似地抬不起来。真想歇口气，可是工头就在身后，只允许人们在大小便时离开工作台。

应该想法捉弄一下这个工头。同我一起干活儿的孩子们，都象我一样大小，都在十四、五岁左右。我们商量好，一齐暗中对付他。结果工头被弄得气极败坏，大发雷霆。

“这些该死的孩子！一群废物！”他一面挥动着双手，一面喊叫：“非把你们教训一顿不可……”

可是我们却不约而同地扔下手里的活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静静地望着这个大喊大叫的工头。大家趁这个机会就可以休息了。我们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教训这个工头，结果，他以后再不喊叫了，也不敢再动拳头了。可是我们的工作条件却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善。

普季洛夫工厂和奥布霍夫工厂的工人以及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我的哥哥伊里亚当时正在喀琅施塔得服役。

“你们要紧紧地团结起来！”他们经常这样说。

可是，什么是工人阶级的真正团结，那时候我们还不太懂得。我们整日劳动在拥挤而沉闷的作坊里，眼界很有限。外面发生的重大事件，常常是过了很久才传到这里。

· 有一回，大街上人声喧闹，好像春泛的河水波涛滚滚。在萨维尔耶夫的这个作坊里，也热闹起来。工作台下面、工

具箱里出现了传单、政治小册子和当局禁止的书籍。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还把读过的内容告诉那些没有文化的工友。因此，发生二月革命和传来关于推翻沙皇的消息时，我们并不感到十分突然。

我们当时想，早该如此，而且我们这个作坊里也该变一变样子了。

可是后来这里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如果萨维尔耶夫还这样压在我们头上，还叫什么革命？”孩子们愤愤地这样说，“到底是谁给他撑腰？”

“究竟是谁，那很清楚。”伊万·季明用嘲弄的语调说，“是临时政府的那些部长们，是克伦斯基。”

季明和我是同年。这个小伙子个头不高，淡黄的头发，一双碧蓝色的眼睛。他比我们觉悟高，能在当时复杂的环境里及时地辨别方向。他很了解彼得格勒各处发生的情况，因此在我们中间威信很高。

我和他初次见面时，就喜欢他。他性格开朗，喜爱交往，精力充沛，干劲十足，讲起话来总是活泼有趣。他还是个歌手，嗓门很高，唱起歌来有些嘶哑，但却能感人心腑，令人喜悦。

瓦尼娅·季明还善于舞蹈①。不管你情绪多么不好，只要一见到他出场跳舞，他那种敏捷灵活、旋跳自如的舞姿定会使你喜笑颜开。他跳的花样很别致，当他顺着圆圈飞快地旋转时，令人眼花缭乱，他的靴子后跟象要冒出火花似的。说实话，我真羡慕他，想拜他为师。有一次，他竟说我成了他的得意门生。听了他的夸奖，我心里美滋滋的，暗下决心，

①瓦尼娅是伊万的爱称——译者

将来一定要在跳舞方面胜过他。

后来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我永远忘不了1917年7月4日那一天。那天中午特别热，大街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我们这些做刺马针的工人站在喀山大教堂旁边，突然响起了枪声，我们朝着作坊奔跑，慌忙之中撞翻了沿途所有的东西才跑回来……几分钟之后，安得列·霍列夫那熟习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他是个铁匠，专门制作锻件毛胚。今天他回来时胆怯地迈进门坎，停住了脚步。这时我们才看清楚，原来他手里托着瓦尼娅·季明。我们的亲人季明，他沉沉地向后仰着头，象已经睡在霍列夫怀里似的。

我们把瓦尼娅放在工作台上。他双眼紧闭，两只手握成拳头……他鼻子底下留着灰白色茸毛似的一撮小胡子，他生来还没有刮过脸，小胡子长得微微地跷了起来。看上去，他原想大声地讲些什么，可是没有来得及。他死了吗？我们今后再不能听他讲话和唱歌了吗？不！我们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这些。他才刚刚十七岁呀……。

瓦尼娅牺牲了。他是被士官生开枪打死的。工人们举着标语，要求那些部长、资本家们满足人民的愿望并且停止战争，可是临时政府下令向工人们开了枪。

我们咬紧牙关，站立在伙伴的尸体旁边。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怎么行动呢？

工头跑过来。他原本是奉老板的吩咐前来把“这个骚乱分子的尸体从作坊抬走”的，可是一看到我们这种神情严厉、怒气冲冲的样子，一下子吓得缩了回去，溜之大吉了。他可能觉察到我们都带着一股要跟他拼命的劲头。

瓦尼娅家里已经没有亲人了。于是决定由我们给他送

葬。

在当时，彼得格勒白天实际上已经处于戒严的状态。白天在中央大街走动是很危险的。通往墓地的各条道路上，随时都可能碰上喝醉酒的哥萨克和放哨的士官生。他们动不动就用鞭子抽人，开枪打人。

幸好这时我哥哥伊里亚来看望我。他是喀琅施塔得水雷教练队的一名水雷手。和他同来的还有一名水兵弟兄，当他们得知我们的不幸时，决定帮着想办法。

这两个水兵确实有办法。他们找来了一车四轮轻便马车，接着给季明的遗体穿上一件水兵衬衣，戴上一顶水兵的无沿帽。然后，马车向近卫骑兵花园驶去，因为这里离海军第二陆战队驻地不远，哥萨克和士官们根本不敢在这里露头。我哥哥伊里亚坐在马车右边，那位伙伴坐在左边，他俩都佯装成喝醉的样子，季明遗体放在中间，象是睡觉的样子。

我们目送着马车，直到“五角”宫。然后车朝海军陆战队拐过去，接着就不见了。

这时我感觉到，就在我与瓦尼娅·季明遗体告别的那个时刻起，我也永别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1917年9月来到了。这时再没有人需要叮当作响的刺马针。作坊倒闭，我们也失了业。

我闲暇的时间比以前多了。我还有另外两个哥哥——彼得和伊万。他们同伊里亚一样，也是水兵。他俩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闲暇时候我常到那里去，关于列宁，我第一次是从他们那里知道的。在他们那里我读了《共产党宣言》，读了布尔塞维克办的报纸和传单。当然，凭我那时候的水平，

对于“宣言”中的深刻思想还是一知半解。不过我却牢牢地记住了一点，那就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在同地主、资本家的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人阶级。

我们开始比较具体地理解了布尔塞维克的口号：“平民要和平，贵人要战争”。

有一天，我到喀琅施塔得去看望我的哥哥伊里亚，没有碰见他。他站岗去了。到了这里我也不客气，倒在他的床上就睡着了。有人用力推我的背，把我弄醒了，我坐了起来，在我面前站着一名水兵，他说：

“崔可夫，你怎么从岗位上溜回来啦？”

显然，他是认错人了，因为我同我哥哥很相象。我沉着地回答说：

“我是崔可夫·华西里，是伊里亚的弟弟。”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水兵是支队委员会的成员。他同我交谈起来：

“你那里怎么样？你怎么在这儿？”

我把自己的想法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甚至我还告诉他，为了向克伦斯基讨还血债，替死难的好友报仇，我准备搞武器。可以看出，他对于我的坦率态度十分满意。他让我想法去找委员会。当我哥哥回来的时候，我把方才同这位水兵讲的话告诉了他。我说，可惜没有打听他的姓名。

“他叫库兹明”我哥哥说，“他是布尔塞维克，是个了不起的人。”

有一次，我又去到喀琅施塔得。在那里很快就找到了哥哥伊里亚。我告诉他，我还没有找到工作。可是话音还没

落，库兹明走了进来。当他了解到我的困难之后，便建议我留在喀琅施塔得，在水雷教练支队当一名水兵。我慌了。我想，我才十七岁，能成为水兵吗？况且还是在喀琅施塔得……这太叫人着迷啦！

“行啊！谢谢你啦！”我说。

一想到马上就要穿上海军服，我激动得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

过了两天，我把一只装零星东西的小箱子带到喀琅施塔得。正象库兹明答复的那样，我很快被编到水雷教练队当水兵。

就这样，我当了兵，开始了新的生活。

十月革命起义之前，我曾两次去彼得格勒，到奥布霍夫工厂去找在那里当工人的老乡，了解他们的思想情绪。派我到那里去的是库兹明，是党交给的任务。我了解到，奥布霍夫工厂的工人正在积极准备起义，在急不可待地等待起义的信号。

10月23日开始组建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支队。支队的成员是经过逐个挑选的。有的支队准备被派到海军第二陆战队；有的被派到波罗的海造船厂。可是不知为什么，哪个支队也没让我参加。这可能是我哥哥伊里亚对我的关照。可他自己却带领一队水兵到彼得格勒去了，我心里感到特别委屈。我想，我也能够缴获士官生的武器嘛！

可是这种委屈的情绪很快就消散了。因为一天以后传来了令人欣喜的消息：列宁领导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我们都感到无限地欢心鼓舞。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关于我二哥伊万的消息，在几个月之前，他失踪了。原来在七月份他被捕入